

“跟进式教育”理念的价值认同机理研究

薛健飞^{1,2}, 浦玉忠²

(1. 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徐州 221116; 2. 常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江苏常州 213164)

摘要:深入探究“跟进式教育”理念的价值认同机理,旨在进一步理解其理论的特殊性、科学性及实效性,丰富我国当前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内涵。其价值认同机理研究从主要哲学渊源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入手,科学分析价值认同的组成要素、逻辑结构及作用机理,从而来印证“跟进式教育”理念独特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其中,总结过往、批判继承,形成客观实践性、社会交往性及历史助推性,是价值认同机理的理论前提;双向建构、双重整合,形成价值共识场、平等对话场及自我生成场,整合世界文明、整合社会秩序及整合公共空间,是价值认同机理的动力源泉;承认趋同、解构重建,促进和谐共存、社会大同,促使螺旋跃升、面向未来,是价值认同机理的基础保障。

关键词:“跟进式教育”理念;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价值认同;机理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6)06-0016-06

“跟进式教育”理念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实践,已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1],其思想引领、心理调适、价值导向、共识凝聚及科学认知功能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及人才培养过程中日益发挥着独特而显著的作用。它的特点为主动性、针对性、时效性、前瞻性及互动性;理论渊源主要是以人为本和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方法原则是主动跟进、有效跟进及持续跟进。深入探究“跟进式教育”理念的价值认同机理,有助于理解这一原创性理论的特殊性、科学性及实效性,还可以将价值认同机理的范式应用到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建设中,从内容、对象、阵地、方式、保障等各个层面给予科学的指导借鉴,进一步丰富我国当前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内涵。因此,“跟进式教育”理念的价值认同机理研究无论从自身角度还是从指导实践角度,既是自我突破、创新发展之需,也是生逢其时、时代呼唤之要。为此,本研究将从“跟进式教育”理念的主要哲学渊源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入手,分析其价值认同的组成要素、逻辑结构及作用机理,从而来印证“跟进式教育”理念的独特价值。

从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切入,探讨“跟进式教育”理念的科学功能,其中蕴含着一个逻辑前

提,那就是必须首先解决“跟进式教育”理念的交往实践性问题。从机理结构来看,“跟进式教育”理念秉承“主体—客体—主体”的主体际交往结构,施行者和受教者都是互为主体的平等个体,共同作用于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客体,从而在形成复杂多元的交往实践体系的基础上,开展丰富多彩的物质活动。从作用类型来看,“跟进式教育”理念属于精神交往实践,它直接指向交往主体的道德旨归,力主个人的社会化、道德化以及核心价值的社会化、普及化,目的是帮助摆脱各种内外条件的约束,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发展。这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是人与人精神的契合”^[2]。从方法原则来看,“跟进式教育”理念尊重交往双方的人格尊严及个性特征,主张平等、沟通、协商及融合。这些正是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区别于传统哲学的关键所在,也是其不断创新突破、指引未来发展的魅力所在。从内涵特征来看,“跟进式教育”理念的继承性特征意味着它对传统的理论与习俗并不是一味地摒弃和否定,而是在萃取精华基础上的海纳百川,在个性发展基础上的良性成长,这与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继承发展的核心精神一脉相承。此外,“跟进式教育”理念的前瞻性特征意味着理论发展的定位是面

收稿日期:2016-09-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3BKS105);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15ZDIXM029)

作者简介:薛健飞(1981—),男,江苏常州人,副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向未来的,当社会呈现出新常态、新事物和新思想时,“跟进式教育”理念要求理论与实践必须与时俱进。个体思想、群体动态、社会运行和时代召唤发展到哪里,“跟进式教育”理念的主体就必须跟进到哪里,抓铁留痕、务求实效地创新思路、寻求对策、对症下药、促进发展。这是“跟进式教育”理念的个性特征,也是其创新发展的动力所在,更是其面向未来的价值旨归,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求新求变、常创常新的科学价值的集中展现。因此,“跟进式教育”理念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其逻辑机理、个性特征、价值追求等都彰显出交往实践的特性。“跟进式教育”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的具体应用,厘清了交往实践理论的价值认同机理,也会对“跟进式教育”理念的合理应用及后续发展有一个科学的认知。

一、继承批判:价值认同机理的理论前提

交往实践“是指多极主体间通过改造或变革相互联系的客体的中介而结成网络关系的物质活动。而交往实践观,即运用交往实践来反思和把握人类社会的观念。”^[3]系统全面地继承、合理有效地批判、自由科学地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固有本性,交往实践理论的形成发展也是遵循这一逻辑特性。交往实践观是马克思对全部历史发展和人类本质进行科学分析、深刻洞见和整体把握的基本理论尺度^[4]。若要捋清该理论中的价值认同机理,首先必须弄清交往实践理论在哪些方面继承、发展了以往哲学,在何种程度批判创新了传统理论,在哪些要素方面彰显了自身价值。在当今社会,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得日趋紧密和复杂,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既是理解当前网络交往实践的一把钥匙,也是厘清、引导意识形态多元共存、有序发展的理论武器,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1. 客观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是在借鉴批判传统哲学、经济学理论上发展而成,具有鲜明的客观实践性特征。传统哲学中,将人类的实践及历史归结为意识的活动,最终取决于道德、意识、意志或者爱。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认为实践是一种“善行”“符合理念的行动”“政治法律活动”。历史发展至17世纪30年代,法国著名哲学家笛卡儿在其代表作《正确思维和发现科学真理的方法论》中,高扬个人的价值与地位,提出了标志其认识论哲学起点的观点“我思故我在”。而后历经启蒙运动的发展,该理论的内在意蕴及核心价值即主

体性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与拓展。尤其在人与自然的发展过程中,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掌控及开发,这一方面推动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同时又进一步强化了“大写的自我”“绝对自我”的主体性作用。德国哲学家康德对实践理论也做了自我界定,将实践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他虽然指出了实践理性的行动指向及特征,却将其限定在伦理道德的范围。黑格尔区分了“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的异同,“理论理性”倾向于对客观存在的被动接受,“实践理性”则强调主体实践活动的创造性。但是他所涉及的实践活动本质上还是抽象的理论活动,实践的本质仍在于精神、观念等层面。费尔巴哈将“实践”等同于犹太商人“卑污的经商”活动,指出了人的真正实践在于理论活动,这导致他的理论失去了真正的“革命性”及“实践批判性”内蕴。上述理论造成了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的背离,而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的首要特征就是坚持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阐述实践活动,摒弃了传统哲学将实践看成是抽象的、唯心的、道德意志决定的精神活动的弊端,而将交往实践分为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和语言交往,并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

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5]

2. 社会交往性

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摒弃了传统哲学忽视人、敌视人的思维取向,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混淆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忽略社会交往在“国民生产力”发展及价值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的不足,始终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反对以往哲学、经济学仅从客观、感性、直观的角度去理解生产实践,明确提出要在客观实践性与社会交往性相结合的基础上来理解其内涵。“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6]生产实践以交往为前提,人们只有在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才能顺利开展生产,交往的扩大促进了生产力在世界范围的传承与发展,这也进一步推进了生产活动的效益。生产实践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深化,正如当前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人类进入了一个以知识资源的占有、分配及消费为主要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步入了数字化、虚拟化的生存空间。这种交往实践的特性集中体现在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阐述中。他认为资本的生产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劳动通过作用在具体的生产资料、自然资源等客观中介,不断创造着商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又通过生产过

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并通过对其不断的抽象提升,最终形成了商品的价值。前者主要是主客关系模式,后者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3. 历史助推性

上述两个特征内蕴着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具有推动历史发展的特性及功能。在交往实践形成的公共空间内,人与人之间都把自身的情感、疑惑、追求等内容传达给彼此,使得人们之间的沟通协调变得频繁而通畅,更好地增进了解与协作,缓解社会的矛盾与压力,真正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其次,交往实践的发展促进了先进技术的创新发展。在原始社会,由于条件的限制,一个区域的先进生产力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作用,影响不到其他地区,地区之间不断重复进行着技术革命,但对社会整体生产力的提升受益不大。只有随着人们之间交往的扩大,一个地区的发明、创造、技术革命等先进生产力才得以在整个社会传播、更新,才能使原先分散的技术力量整合成历史合力。“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7]马克思更是在其晚年的著作《人类学笔记》中指出,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要想跨越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卡夫丁峡谷”,必须充分利用世界交往实践所带来的资金、技术、文化及管理先进生产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交往实践也会促使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原先适宜的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深入发展,越来越成为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桎梏,不断迫使其变革生产关系,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但新的生产关系又会在新的生产力发展层面上,变成牵制的绳套,再次促使其不断自我突破、更新及超越。

二、建构整合:价值认同机理的动力源泉

双向建构、双重整合是多种价值观念在交往实践过程中不断走向共振、趋同及认同的动力源泉。透析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的建构整合功能是认清价值认同机理的重要前提,其中,首先必须厘清双向建构、双重整合的科学定义以及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其次才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各自对价值认同的作用及功能。所谓双向建构,即指交往实践一方面在多极主体基础上建构全球性交往共同体,另一方面,以交往实践的返身性而达到主体的自我重构和创新,构建具有独特个性的多极主体形态。所谓双重整合,即一方面在交往整合中产生主体系列——参与全球交往的多极主体,另一方面按对应整合生成交往关系系列——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等

新秩序、新规则和新格局^[8]。学界一般将双向建构与双向整合认定为是同时进行的,不进行更为细致的区分,更有甚者将两者混合在一起考量。这种做法一方面不利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的科学认知及把握,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在现实的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理念层面的含混与误解,方法路径上的盲目与无措。其实,两者在共时发展的过程中也暗含着一定的逻辑关系,双向建构是双重整合的理论预设,双重整合是双向建构在更高层次、更深层次上的价值跃升。相对而言,双向建构更多地侧重于从外围多元价值的交往实践建构共同体及个性自我,双重整合则更倾向于从发展共同体的内部融合、发展出新的规则及主体个性。

1. 双向建构:交往沟通、求同存异;自我建构、百家争鸣

交往共同体是指多极交往主体之间通过沟通、交流、协作、融合等多种途径形成的一种互相尊重、互相认同,且具有共同理想、共同愿景的价值、利益同盟体。双向建构首先通过主体之间的实践交往,使得不同主体的资质、能力、性格、思维等特质尽可能地获得最大公约数,个体之间包容共生、和谐并存,逐步建构起具有共同价值旨趣的交往共同体。同时,各极主体由于交往实践的返身性获得了自我认知、能力、道德及世界观的重塑。这种重塑不仅发生在主体与主体之间,同样也会在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过程中产生。当主体利用一定的中介全面改造客体发生形变、质变时,客体会向主体不断呈现出新的奥秘及规律,进一步更新主体的知识体系,从而不断提升主体的认知能力。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提升,主体间的交流变得便捷与高效,个体不断形成自身富有个性的品质特征。推而广之,国家间的交往实践也是这样。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的双向建构功能是通过组建一个个场域,最终形成一个交往共同体及多极个性主体。

(1) 价值共识场

交往主体之间在平等的互动中,不断实现着各自思想、情感、道德、人格、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交流沟通,推动着多方的价值观念及道德追求逐步走向认同,形成一个传递思想道德旨趣、道德行为规范及生命本质内涵的共同价值场域。在这个场域中,道德“黄金律”及世界性的普世伦理价值成为了最大的价值公约数,前者“它阐明了正义的基本要求,每个人的行为都必须以同意标准要求,没有人可以例外或拥有特权。”^[9]而后者“并不是指一种全球的意识形态,也不是指超越一切现存宗教的一种单一的统一的宗教,更不是指用一种宗教来支配所有别的宗

教。全球伦理指的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10]在价值共识场中,这些价值公约数时刻规范着主体间的思维及行动。

(2) 平等对话场

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通过双向建构形成了一个交往共同体,这一共同体为每一位交往者获得其正当利益提供了切实的保障,避免了与他人发生根本性的冲突。这是由于自由、平等、公正、沟通协调在其中起到了润滑的作用,自由对话、沟通协调不仅是交往共同体逐步形成的前提,也是其持续发展的关键命脉。纵观历史发展,平等对话场身处交往共同体中,“(1)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3)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11]即个人在交往实践中不能只追求自己的目的,而忽视了自己的义务担当,也不存在只履行职责,毫不追求个人目的的境况。这种双重使命对交往过程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都是义务与权利的统一体,尤其是在商品经济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3) 自我生成场

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内蕴的客观实践性及多极主体性,一方面在建构了人与人之间日趋广泛的社会关系的同时,使得个人的自主活动与物质的生产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原先自我的无序发展日益朝着自由全面的科学发展转变,进一步促进了人本质特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也不断促使着交往主体的自我认知体系、结构和能力走向完善。客观实践性使得主体的认知被全部置入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时刻接受着实践的检验与调整,一切认知中的迷津都将在实践中找到答案,一切认知中的缺陷也会在其中得到不断的修正与改进。这种认知模式彻底区别于唯心主义认识论,完全将认知活动及检验完善的标尺从纯粹理论视阈、无客观底板的领域转向了真实可信的实践过程。同时,随着交往共同体的生成,认知主体也会主动介入其中,全面吸收交往共同体带来的公共的价值理念、知识体系、科学规律、认知图式及方法原则,使得交往个体一开始就站在了时代文化的最高水平上来重构自我的主体本质,彻底打破私人认知的狭小空间及视野,不断接受共同体规约的习俗、纪律、道德、规章制度等社会规范,时时匡正认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颇,进一步使得自我个体的科学认知具有规范性、普遍性及收敛性。

2. 双重整合:异中求同、价值再升;同中之异、百花齐放

双重整合一方面是指各具特性的多极交往主体在平等对话、相互尊重、海纳百川、自由发展的基础上,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逻辑层面上不断整合出新的、更富价值意义的社会交往关系,包括国家之间、社会之上、个人之中新的秩序、规章、格局及规范;另一方面是指多极主体在交往共同体及新的交往实践关系中,和谐共处、协调发展,不断吸收着共同价值场域所带来的认知层面、价值层面、道德层面的新养分,吐故纳新、螺旋上升,不断在共同体中整合出区别于最大价值公约数的新个性、新价值及新人格,这就为交往实践的下一次双向建构、双重整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双重整合在价值认同机理中发挥着十分独到的作用。

(1) 整合世界文明

随着经济一体化发展,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已是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由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受自然资源、区位地理、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基础等因素的影响,每个国家都迫切希望更加全面、更加彻底地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格局中,充分利用其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及文化理念,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这种互相依托、互为前提的发展关系及取长补短、弯道超越的发展冀求是世界文明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此外,各国的发展也都是在生产活动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历史生产范式使得国与国之间在世界范围内的交往实践、共荣共生具有了相似性、契合性及可能性。总之,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规范、科学技术、政治伦理、法律道德等历史文明只有在交往实践的过程中才得以世代相传、延绵不绝,可以说,世界文明的整合程度完全取决于国家之间交往实践的频率、广度及深度。

(2) 整合社会秩序

交往实践观所形成的社会秩序会使得个体的主动性、创造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个体也会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对这种秩序的高度认同感及归属感。整合而成的社会秩序又由于其自身的合理性及合法性,进一步促使社会公众对它的接受和承认、遵循及实践。合理性以效率为目的,严格遵守自然规律,奉行理性至上。它在主体际关系中发展,使得主客体关系与主体际关系趋向和谐。合法性以构建公共价值取向为旨归,秉承自由、平等原则,遵守社会规范及伦理道德。两者起源各异、功能互补,共同成为交往实践中的规范向度。合理性构成合法性的基础,合法性在历史上作为文化价值而规约着合理性的形成

空间^[12]。

(3) 整合公共空间

交往实践观整合出富有个性和特质的交往主体,同时也在交往共同体中形成了一定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结构中,多元社会关系序列、多种价值观念、多样交往个体都会在其中发展形成,也为社会公众表情达意、交往沟通以及核心价值观念涤荡芜杂、引领疏导提供了有利平台。在此空间中,其实践原则是所有交往主体都可以参与其中,没有种族、性别、阶级、受教育及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所有交往主体都可以各抒己见、各表其情;其运行原则是平等交流、多元互通、深入对话、协同发展;其指导原则是在社会规范的指导下,多极主体可以自由组合和分散,共同商讨普遍性利益问题;其社会功能是两个层次上的社会整合功能:第一次整合可避免“动机危机”,由于公共领域使人们在交往中彼此认同,获得了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第二次整合可避免“合法性危机”,因为公共领域保证公众的参与和讨论而使政治获得了合法性^[13]。

三、趋同重构:价值认同机理的基础保障

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中的趋同重构是一个逻辑递进、价值跃升的过程,它使得交往实践的应用及服务走向国与国之间,步入时代的最前沿。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对传统哲学、经济学进行继承批判,对多极交往主体、多元价值理念进行双向建构、双重整合,不断推动着片面的个人逐步走向完整的个人,物化异化的个体逐步走向自由全面的个体;促进了交往空间从狭小区间扩大至世界范围,交往效率从日行百里、日行千里飞跃至光速运行;有助于第三世界从封闭发展逐步跨越“卡夫丁峡谷”,实现本国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而纵观上述变迁,扩大交往实践、寻求价值认同是其中的一条主线及基调。

1. 承认趋同:和谐共存、社会大同

当今以互联网为主要特色的全球化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例如,如今网上购物和网络支付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的生活方式,也深刻地影响了传统的销售模式。微信和微博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社交方式,也对传统的电信和移动通信行业带来了冲击。同样,网络课堂、开放课程,MOOC(慕课)的兴起,不仅加速了知识的数字化、网络化和碎片化,拓展了知识的获取渠道、改变了知识的获取方式,同时也突破了传统知识传授讲求系统性和完整性的模式。这必将对人们的认知结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产生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又如,与传统教育相比,现在的学生更关注个

人发展,更关注于时代潮流,他们的学习兴趣、学习欲望、学习习惯、学习方式都有了很大的差别。因此,如何在交往实践所形成的传统社会共识及规范的基础上,凸显交往主体的本质特性,着力构建个性化教育模式,使学生能够有意识地设计自我,按照一种理想的人格来充实和展现自己。这些都是当前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面临的重大课题。在网络虚拟社会中,个人的自我意识、自我需求、自我个性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显得更为明显,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必须在更复杂的互联网空间中构建出公共价值理念,寻求交往主体间及国家之间的承认与趋同。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则必须在交往主体个性化、多样化,交往媒介信息化、共时化以及交往范围全球化、一体化的基础上综合考量。

2. 解构重建:螺旋跃升、面向未来

如今,交往实践的媒介发生了质的变化,使得原先的交往共同体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交往技术的网络化、信息化,使得交往实践的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促使现代世界发生了四大变化:①生产过程全球化;②无中心化;③跨国公司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④生产的跨国化不仅是全球前所未有的统一的根源,也是分散化的根源^[14]。在这种趋势下,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的理论来解读分析,从而更加有效地指导我们的交往实践及社会的经济发展。这一历史拷问,倒逼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再次进行解构重建,不断丰富其理论内涵,主动更新其方法路径,使其不断迸发出新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的解构重建是一种历史进步,与时代发展紧密契合。和谐共存、价值共识是交往共同体构成的主要因素,而矛盾冲突、解构重建也是其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这种意识是一种“重叠共识”,是多元社会中无数“他者”的公共理性的结果,是一种充满个性和差异性的政治整合,这种整合不是追求单一和一致,是在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求共识^[15]。价值共识与解构重建看似是两个根本对立的方面:一个在于求同存异,一个在于边破边立;一个着眼于当下,一个放眼于未来。但从本质上看,两者是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的,也是一种螺旋跃升的关系。

四、结 语

总之,“跟进式教育”理念具有鲜明的交往实践特性及科学的价值认同机理。在这机理中,总结过往、批判继承是其理论前提;双向建构、双重整合是其动力源泉;承认趋同、解构重建是其基础保障。在“跟进式教育”理念的指导下寻求价值认同,就必须

坚持坦诚相待,这是价值认同的正确定位。坚持外俊内秀,这是价值认同的具体要求。坚持两厢情愿,这是价值认同的主体际关系。坚持水到渠成,这是价值认同的正常过程。坚持相敬如宾,这是价值认同的有效策略。坚持共荣共生,这是价值认同的根本目标。

如今,“跟进式教育”理念已经开始应用于网络虚拟社会,重点围绕网络虚拟社会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问题。在充分汲取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经验和不足,全面认清网络虚拟社会匿名性、开放性、即时性等特征的基础上,“跟进式教育”理念开始迸发出独特的个性特质及理论魅力,即前瞻性、主动性、针对性、全面性、实效性、与可持续性。具体而言,在网络虚拟社会中,前瞻性表现为螺旋跃升,直面未来;主动性表现为以人为本,主动引导;针对性表现为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全面性表现为纵横结合、多元多层;实效性表现为价值认同、付诸实践;可持续性表现为持久长远、永不停息^[16]。将上述“跟进式教育”理念内蕴的独特个性与网络虚拟社会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的时代课题紧密结合,深入研究两者之间的作用机理,是一个非常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方向。该机理模式集原则、方法、路径、评估、推广于一体,在时间上强调及时、主动与有效,分为预期引导式与反馈评价式跟进;在空间上强调全面渗透,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在内容上强调理念跟进、教育跟进、教学跟进、管理跟进、服务跟进和活动跟进,显示出操作性强、实效性好、推广价值高等特点。强化主体元素的塑造,促进理念创新与能量聚合;拓展客体元素的功能,推动情感共鸣与知行转化;发挥载体元素的作用,探索耦合模式与转化途径;延展介体元素的空间,借鉴传播经验与运作方式^[17]。这也将成为“跟进式教育”理念创新发展的新突破和新领域。

参考文献:

- [1] 薛健飞,浦玉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跟进式”培育研究[J].理论与改革,2014(1):133-137.
- [2] 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鲁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 [3] 任平.新全球化时代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再论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J].哲学研究,2000(12):14-22.
- [4] 任平.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5] 任平.论交往实践的三重结构[J].社会科学战线,1992(1):25-34.
-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中共

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7.

- [7]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14.
- [8] 任平.新全球化时代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再论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J].哲学研究,2000(12):14-22.
- [9] H.T.D.罗斯特.黄金法则[M].赵稀方,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42.
- [10] 孔汉思,库舍尔.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M].何光沪,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12.
-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96.
- [12] 任平.交往实践辩证法:对立向度与规范体系[J].哲学动态,1999(5):18-25.
- [13] 罗志发.论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和谐社会意蕴[J].国外理论动态,2007(8):85-90.
- [14] 贺金瑞.交往实践全球化形态及其内在矛盾[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5):28-35.
- [15] 赵成斐.交往实践论域中“他者”的政治旨趣[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55-59.
- [16] 薛健飞,浦玉忠.网络虚拟社会中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跟进式培育探析[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7(2):12-19.
- [17] 徐红波.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构成要素异同辨思[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90-95.

(责任编辑:吴 玲)

